
从“文化的社会史”到“社会的文化史”： 罗杰·夏蒂埃的文化史研究

李任之

【摘要】 作为著名的书籍史家和文化史家，罗杰·夏蒂埃深刻地反思了法国的心态史研究传统，批判了计量方法在文化史中的应用。他认为，仅仅通过考察文化产品的流通状况无法了解民众的心态，真正的书籍史和文化史研究应该建立在探讨阅读实践以及作者、文本、书籍与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在夏蒂埃看来，读者无时无刻不在“占有”文本的意义，他们的社会层级和文本的物质载体等因素都决定了他们的阅读方式。除了实证研究，夏蒂埃还从理论上重新诠释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并不是所谓的“第三层级”，而是人们用来理解、规划与定义社会实在的“表象”。由此，夏蒂埃的所谓“社会的文化史”试图恢复文化的自主性，并且凸显文化史研究对于社会史的价值，考察夏蒂埃的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法国史学的了解，帮助我们认识文化史研究的多样性。

【关键词】 心态史；阅读；占有；表象 “社会的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 K0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873(2021)05-0193-13

【作者简介】 李任之，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100084

作为 20 世纪法国历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巨擘，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社会与经济史年鉴”的一大初衷，是为了取代赛诺博思(Charles Seignobos) 和朗格洛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 倡导的实证主义史学，改变带有德国色彩的、以政治与外交事件为中心的研究路数，并且在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聚焦社会—经济层面、以问题为导向的新史学。不过，费弗尔与布洛赫并没有因此忽略观念和文化的重要性：例如，后者的名著《国王神迹》即讨论了英法国王的“神圣触碰”为何在中世纪的信仰体系中被认为具有治病的功能；而前者更是深受布留尔(Levi Bruhl)、布隆代尔(Charles Blondel) 和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等社会心理学家的影响，力图探究某个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集体心理和思维工具(outillage mental) ——他的《16 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正是这种研究方式的一则极佳范例。^① 然而，随着布洛赫和费弗尔的相继去世，以及经济史和人口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蓬勃兴盛，思想文化史在法国陷入了低谷，除了芒德鲁(Robert Mandrou) 等少

① 不过，正如年鉴学派的另一位成员安德雷·布赫热尔指出的，布洛赫与费弗尔二人对于“心态史”的构想其实存在一些差异。首先，相比于费弗尔，布洛赫较少关注集体心理学的层面。其次，《马丁·路德与他的命运》和《拉伯雷的世界》等作品采用的研究路径表明，费弗尔没有完全忽略所谓的精英思想，而是关注个体观念与时代风气的互动。相比之下，布洛赫更重视那些属于集体的、未经反思的信仰，以及信仰和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说，1970 年代重新兴起的心态史承接的其实是布洛赫而非费弗尔的传统。见 André Burguière, “The Fate of History of Mentalities in the Annales,” in Stuart Clark ed., *The Annales School: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I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404—417.

数历史学家外,集体观念与集体心理很少受到关注。^①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法国历史学家们才开始重新关注思想、文化和信仰的历史,而所谓的“心态史”(histoire de mentalités)也逐渐成为一种极具法国特色的文化史研究路径。

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通常被视为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的代表人物。^②作为当代法国最卓越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毕业于索邦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杜普隆(Alphonse Dupront),随后进入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于1984年起担任研究院导师至今。2007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院士。自1970年代起,夏蒂埃即致力于文化史、书籍史以及阅读史的研究,他不仅指出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的诸多弊病,而且对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关系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理论深度。一些英语世界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家曾经在1990年代末对夏蒂埃的史学思想——特别是针对他有关“文化”以及社会实在的看法——有过讨论。国内学界近年来也已有不少学者介绍过他的文化史研究。^③不过,怎样在法国史学的脉络中评价夏蒂埃作品的价值,怎样理解夏蒂埃对“文化”这一概念的阐述,以及怎样看待夏蒂埃的文化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等问题,学界似乎尚未有深入讨论。本文首先考察夏蒂埃的书籍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大致方法、路径和成果,以及他的研究与心态史的区别;其次分析夏蒂埃如何界定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他的文化理论在哪些方面受到布迪厄和埃利亚斯的影响。

一 夏蒂埃论阅读实践及读者与书籍的关系

作为最常见的文化产品之一,书籍无疑是了解某个时代的流行观念和大众心态的关键史料,书籍史研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心态史的一个重要分支。许多知名法国历史学家都在这一领域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费弗尔和亨利-让·马丹(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书籍的来临》(*L'apparition de livres*)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作品,而芒德鲁也在他的《17至18世纪的大众文化》(*De la culture populaire aux 17^e et 18^e siècles*)中对“蓝皮丛书”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以孚雷(François Furet)为代

① 芒德鲁出版于1961年的作品《现代法国简史》(*Introduction à la France moderne*)的副标题——“历史心理学文集”(Essai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非常明确地说明了他的治学旨趣。Peter Burk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Cambridge: Polity, 1990, pp. 74—79.

② 《年鉴》和所谓的“年鉴学派”常常被视作20世纪法国史学的代名词。然而到了20世纪末,包括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在内的一些“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也开始对这个概念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罗什指出,并不存在一个以“年鉴”为名的学派(école),它不过是人为建构的产物。问题在于,我们似乎很难从一个精确的角度定义“年鉴学派”。从机构的角度来说,如果仅仅把是否供职于由布罗代尔创立的巴黎高等社会研究院视作“年鉴学派”成员的身份标准,那么“年鉴学派”的范围似乎就过分狭窄了。如阿里耶斯(Aries)、杜比(Duby)和伏维尔(Vovelle)这样的学者就要被排除在外。他们和年鉴学派有着个人关系或研究方法上的亲缘性,但都从未在高等研究院任职。如果将曾经在《年鉴》上发表过论文的历史学家统统算上,范围则会过分宽泛。雅克·雷维尔由此提出,应该从“非连续”的和“非融贯”的视角看待“年鉴学派”,将其理解为一种“年鉴运动”。本文试图相对淡化夏蒂埃身上的“年鉴学派”色彩(事实上,他的研究也不是单纯地可以为这个概念所概括的),从更宽泛的法国书籍史、心态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下分析他的研究路径。见玛丽亚·露西亚·帕拉蕾丝-伯克《新史学: 自白与对话——九位当代最著名新史学家的访谈录》,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30页; Jacques Revel and Lynn Hunt eds.,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p. 4.

③ 如 William Sewell, Jr., “Language and Practice in Cultural History: Backing away from the Edge of the Cliff,”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1, no. 2 (1998), pp. 241—254; Bonnie Smith, “One Questions for Roger Chartier,”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1, no. 2 (1998), pp. 213—220; Jonathan Dewald, “Roger Chartier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1, no. 2 (1998), pp. 221—240. 国内目前有关夏蒂埃的文化史的研究文章可见周兵《罗杰·夏蒂埃的新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沈坚翻译的夏蒂埃访谈《过去的表象》(李宏图、王加丰编《表象的叙述》,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3—138页)是国内对于夏蒂埃史学思想最早的译介之一。另见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吴弘渺、张璐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表的一批学者更是极大地拓展了书籍史的研究范围,特别是利用官方档案中有关出版物的特许权(*privilège*) 与默许权(*permission tacites*) 申请,对法国大革命前的书籍传播情况进行了详实统计。^① 夏蒂埃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从书籍史研究开始的,尤其是以主编身份参与撰写、编订了《阅读的实践》和四卷本《法国出版史》。^② 面对已有的研究,夏蒂埃并没有亦步亦趋,而是从1980年代开始逐步反思甚至批判某些书籍史家和心态史家采用的研究方法——相关的论文被先后集结成《旧制度法国的阅读与读者》《文化史:实践与表象之间》、《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欧洲的读者、作者与图书馆》以及《悬崖边缘》等出版。^③ 在他看来,真正的书籍史研究不应该止步于统计书籍的出版数量和传播范围,而是需要着力于考察所谓的“阅读实践”。

由于经济史和社会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兴起,计量方法一度占据了法国历史学界的主流。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史家恩斯特·拉布鲁斯(*Ernst Labrousse*) 扮演了关键角色。^④ 一方面,他常年在索邦任教,培养出包括古贝尔(*Pierre Goubert*)、肖努(*Pierre Chaunu*)、比拉尔(*Pierre Vilar*) 和阿居隆(*Maurice Agulhon*) 在内的一批优秀经济和社会史家。另一方面,拉布鲁斯在《18世纪法国的收入与价格变化论纲》(*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以及《旧制度末到大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 这两本被誉为“影响了一代人的圣典”中成功建立了一种被称为“系列史”(*l'histoire sérielle*) 的经济—社会史研究范式。^⑤ “系列史”需要历史学家大规模统计居民收入、商品价格、区域人口、物品分配等数据,分析它们在某个时间段内的变化情况并将其汇总,从而得出某地在某个关键时间点的社会“局势”(*conjoncture*)。^⑥ 值得注意的是,复兴于1970年代的心态史虽然将文化、心态视作研究对象,但许多受拉布鲁斯影响的心态史家仍然热衷于运用“系列史”的方法。他们将文化视作经济与社会之上的“第三层级”,通过收集签名、遗嘱、财产清单、私人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和书商的订购单等材料,来分析民众的识字率、死亡观和婚姻观。^⑦ 如果和以经典文本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思想文化史比较,这种研究路径显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例如,达恩顿对比了伏维尔(*Michel Vovelle*) 与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 二人对于死亡观念的研究,发现前者基于统计死者遗嘱的研究明显更具说服力。^⑧ 正如雷维尔(*Jacques Revel*) 指出的,费弗尔和布洛赫的作品之所以难以模仿,不仅是因为它们的伟大,“更是因为他们并未划定一套可被借鉴的研究标准”;直到“系列史”研究被应用于文化领域,心态史才真正风靡法国史学界——“不仅因为这依然是一

① 关于法国书籍史的研究情况,可以参见洪庆明《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Roger Chartier dir., *Pratiques de la lecture*, Paris: Rivages, 1985; Henri-Jean Martin and Roger Chartier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Paris: Promodis, 1982—1986.

③ Roger Chartier, *Lectures et lecteur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aris: Seuil, 1987; 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trans. by Lydia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Roger Chartier, *L'ordre des livres: Lecteurs, auteurs, bibliothèque en Europe entre XIVe et XVIIIe siècle*, Aix-en-Provence: Alinéa, 1992; Roger Chartier, *Au bord de la falaise: L'histoire entre certitude et inquiétude*, Paris: Albin Michel, 1998.

④ 关于拉布鲁斯与拉布鲁斯学派,国内学界已经有一定关注。见庞冠群、顾杭《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法国拉布鲁斯史学探析》,《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1期;周小兰《拉布鲁斯经济社会危机理论研究探析》,《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等。

⑤ Philip Daileader and Philip Whalen eds., *French Historians: 1900—2000*,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0, p. 366.

⑥ “conjoncture”是拉布鲁斯经常使用的一个著名概念,但是无论在英文还是中文中似乎都很难找到一个非常贴切的对应词。大体而言,它指的是看似并不相关的经济与社会趋势,在某个关键点上汇聚并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并造成某种社会后果。

⑦ Pierre Chaunu, “Un nouveau champ pour l'histoire sérielle: le quantitatif au troisième niveau,”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Fernand Braudel*, T. II, Toulouse: Privat, 1973, pp. 105—125. 需要指出,并非所有的心态史家都支持计量化方法,如杜比、阿里耶斯和勒高夫就对此有所保留。

⑧ Robert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pp. 268—290.

片未被开垦的领域,更因为它有了一套可被模仿的方法”。^①

然而在夏蒂埃看来,单纯统计书籍等文化产品在不同阶层的分布和传播情况无法全面地反映某个社会的整体思想,肖努等人提倡的所谓“第三层级的系列史”忽略了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和阅读实践的多样性。例如,财产清单中书籍的记录往往并不完整,且死后留下财产清单的规定只存在于某些特定行业之中。^② 首先,拥有书籍并不是进行文化活动的必要条件。夏蒂埃发现,我们视为天经地义的私人化“默读”只是从18世纪才开始在欧洲成为常态,而此前更为流行的阅读方式是集体阅读或高声朗读。在16、17世纪的沙龙、作坊、乡村和教堂中,一群人围坐共同聆听某人朗读书籍和报刊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有时听众只需支付一笔很少的费用就可以了解时事。^③ 其次,被阅读的书籍并不一定属于读者:朋友之间借阅图书并不罕见,而大量的图书馆和阅览室(*la chambre de lecture*)为支付年费的读者提供书籍、温暖的阅读环境和饮食。^④ 再次,书籍并不一定是读者能够接触到的唯一文化制品。18世纪以前的法国存在种类繁多的所谓“阅读快餐”(matériaux éphémères),例如海报(*placard*)、小报(*canard*)和手册(*occasionnel*)。这些印刷品价格低廉,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宗教和民间故事等,除了文字还配有图片,甚至有时也会在公开场合张贴,很受民众青睐。^⑤

除此之外,夏蒂埃还指出,“第三层级的系列史”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是读者与书籍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透明的,读者会自觉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书籍中的内容。和罗兰·巴特、德里达及新批评学派一样,夏蒂埃认为,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就不再拥有它的最终解释权,他不可能将自己的写作意图完全传递到读者的脑海中;然而和巴特等人更强调文本的结构不同,夏蒂埃致力于探究的是不同群体和阶层对于同一文化产品的差异性理解。他提出,阅读并不是一个“施予(imposition)与接受(réception)”的过程,读者会时刻反抗作者、审查机构和出版商企图施加给他们的意义——夏蒂埃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占有”(appropriation)。^⑥ 换言之,系列史至多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谁”(qui)阅读了“什么”(quoi),然而真正的阅读史需要进一步追寻“为什么”(pourquoi)读与“怎样”(comment)读。

在夏蒂埃看来,如果仅仅了解书籍的出版数量和分布情况,而不考虑读者的阅读方式,那么思想文化史家很可能会陷入一种错觉:观念和事件、阅读和行动之间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例如,法国大革命与启蒙运动是否具有以及在哪些方面具有联系一直是受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关这一主题的经典著作无疑是莫尔内(Daniel Mornet)的《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莫尔内几乎穷尽了18世纪中后期的出版物,通过考察各种回忆录、期刊杂志和政治陈情书,试图在革命情绪的酝酿与民众阅读的书籍之间建立某种关系。与他的思路类似,达恩顿通过研究大革命前的地下文学,指出色情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王室在人民心中的神圣感,从而使大革命成为了可能。^⑦ 夏蒂埃的名作《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回应莫尔内和达恩顿的研究;他的核心观点是,民众不会不加反思地接受书籍中的观念,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一定受到某种观念的指引。夏蒂埃引用历史学家阿莱塔·法治(Arletta Farge)对于法国大革命前“反动言论”(mauvais discours)与谣言的研究,指出激进情绪与民众的阅读可能并没有直接关系,攻击、亵渎王室的言语其实早在大革命爆

① Jacques Revel and Lynn Hunt eds.,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p. 25.

②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by Lydia Cochra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84.

③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p. 145—158, 218—239.

④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p. 202—218.

⑤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p. 158—170.

⑥ Roger Chartier, *Ecouter les morts avec les yeux*, Paris: Fayard, 2011, pp. 81—87. 法语中,“appropriation”的日常用法和英语大体一样,通常指的是未经他人的允许将物品占为己有。通过使用这一概念,夏蒂埃希望传达的,是读者往往按照自主的方式理解文本。

⑦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发前近半个世纪就已流传于民间。由此，“公共舆论并不是因为集体阅读传单与小册子而出现的，它的发展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的主张与大众的阅读内容是完全无关的”。^①换言之，所谓的哲学书籍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恰恰是因为它们宣传的精神早已被接受；大众很可能没有在书籍里得到教育与指引，而只是从中找到了他们愿意看到的内容。书籍没有制造大众情绪，而是被大众情绪制造。^②

夏蒂埃在发表于《年鉴》杂志上的长文《乔治·唐丹：社会表象》中，则借用了莫里哀的一部戏剧进一步分析、介绍了“占有”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对于“占有”的研究应该将不同的文本解释重新放回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决定因素之中进行考察，同时不忘考虑这些解释受制于哪些制造意义的实践活动。^③《乔治·唐丹》首演于1688年，是莫里哀为了路易十四的庆典创作的一部喜剧。故事讲述了一个富有农民娶了一名贵族的女儿为妻，本以为可以借此跻身上流阶层，然而却遭遇不幸。这部剧在凡尔赛首演之后，又在巴黎市政厅面向普通市民重新演绎。夏蒂埃发现，凡尔赛和巴黎的观众对作品的解读视角有着很大差异。在凡尔赛的贵族观众看来，唐丹居然愚不可及地认为可以将自己的财富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没有意识到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他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而是别人如何看待他。此外，当时某些地区恰巧在推行贵族资格的审查，这部戏剧的主题也不禁让贵族们心中泛起涟漪，开始思考自己地位的合法性到底来自于何处。巴黎的平民观众则有着不同的观剧感受：他们大多将其视作一种警示，告诉自己应该安于现实身份，切莫产生僭越的念头。^④夏蒂埃认为，莫里哀究竟是否有意设置了那么多诠释的可能性已经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观众都会反抗并且“占有”文本的意义。

然而，夏蒂埃可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是鉴于阅读行为很难留下踪迹，那么如何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考察普通读者“占有”文本的方式？夏蒂埃回应道：一方面，历史学家依然可以通过演出宣传册、新闻和回忆录大致了解当时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个体读者对于文本的“占有”本就不可能是任意的，因为意义的生产是“超越控制”（*contraintes transgressées*）与“受限自由”（*libertés bridées*）的综合结果。^⑤事实上，达恩顿和金兹堡等其他文化史家也同样认为，读者的理解不可能是完全个体化的，而是受到他所处文化的制约。达恩顿提出：“读者通过将文本纳入已有的文化框架内从而发现它的意义。”^⑥金兹堡则在著名的《奶酪与蛆虫》一书的前言中表示：“如同语言一样，文化为个体提供了一套潜在的可能性——就像一个灵活但不可见的笼子，人们可以在里面施展自己受限的自由。”^⑦在夏蒂埃看来，除了文化背景之外，个体思维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结构和阅读方式——尤其是文本的题材与物质载体同样也是改变或增加意义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例如，夏蒂埃发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观众在如何认识《乔治·唐丹》的类型上存在很大分歧。《乔治·唐丹》包含了许多芭蕾与歌唱成分，这使得有些观众将它视作讽喻剧，有些人则只把它当成歌舞剧。对前者而言，这部作品是某种社会“表象”，反映了社会实在；而后者则没有看出这一点。换言之，夏蒂埃力图说明，文本的意义是被多种因素决定的，不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不透明，文本

① Roger Chartier,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trans. by Lydia Cochran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5; Arlette Farge, *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ème siècle*, Paris: Seuil, 1992.

②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Lydia Cochra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85—86.

③ 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p. 13.

④ Roger Chartier, *Forms and Meanings: 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Codex to Comput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p. 43—82.

⑤ Roger Chartier, *Ecouter les morts avec les yeux*, p. 62.

⑥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 186.

⑦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by John and Anne C. Tedeschi,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xxviii.

的载体本身也会影响对文本的解读。

二 夏蒂埃论作者、文本与书籍的关系

夏蒂埃有关书籍史研究的一个核心主张,是文本并不等同于书籍,文本的物质载体会产生额外的意义,而这是计量方法无法反映的。首先,书籍的排版和格式上的细微变化会暗中影响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甚至改变他们对文本内容的理解。^① 例如,18世纪英国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曾表示,阅读对开本的书(folio)就像与他人早晨商谈事务,四开本是晚饭后的伴侣,而八开本与十二开本则陪他度过夜晚的时光。^② 此外,段落前的数字编号和装饰性符号,以及段落的划分也都可能会对阅读产生不小的影响。例如,《圣经》曾经并不“留白”,没有清晰的段落划分,而当近代出版商开始对圣经进行分段时,有人认为这破坏了神意的融贯,将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任何的教派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找出对自己有利的段落加以阐发。^③

其次,文本在印刷、出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被改变。夏蒂埃在着重考察了旧制度法国以及黄金时代西班牙的书籍出版情况后,发现作品完成之后一般需要先由职业抄写员誊抄,这个抄写本被称为“完成稿”(fair copy 或 original)。由于抄写员经常会增加手稿中没有的符号,修改拼写错误,并改动不适合出版的内容,所以“完成稿”与作者的手稿已略有差异。随后,“完成稿”会被呈送至隶属于王室的委员会进行审查,通过审查的“完成稿”才能被送到印刷作坊。在印刷之前,校对工人还要对文本的标点、拼写和格式进行修改,最后才由排字工人排版、付刻。校对工人的改动大都基于个人经验与习惯,所以通常会有多个版本,而且在校对和排字过程中错误时有发生。^④

第三,出版商会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而对文本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修改。例如,夏蒂埃曾经对“蓝皮丛书”(Bibliothèque bleue)进行深入研究。“蓝皮丛书”是一种在大革命前长期流行于法国的系列书籍,因其封面通常为蓝色而得名,最早由特鲁瓦(Troyes)的几个出版商生产、贩卖。他们的策略是寻找那些已经出版很久、失去了许可权(privilège)的经典文本,以低廉的价格刊行,由小贩沿街叫卖,目标人群则是城市中(后来才流通到农村)的民众。夏蒂埃发现,为了适应普罗大众跳跃式的阅读方式,书商通常会增加章节与段落的数量,附上原书没有的标题与小结,并且删改他们认为不受普通民众欢迎的内容。^⑤ 由此,夏蒂埃指出,物质载体的变化会相当程度上改变作者希望赋予文本的意义,创造某种不受作者控制的全新“阅读性”(readability)。一方面,“物质形态和文本样式通过其本身的结构反映了目标读者的期望和能力”;另一方面,读者也通过共有的文化建立群体和阶层的认同——“与其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固有的社会层级,不如说作品反而塑造了它们各自的社会场域(aire social)”。^⑥

值得注意的是,夏蒂埃并没有止步于考察书籍的出版过程,而是进一步指出,我们之所以理所当然地将文本等同于书籍,是自17、18世纪以来,作者的地位不断凸显、文本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的结果。1969年初,福柯在法国哲学学会做了题为“作者是什么?”的演讲,并提出了“作者一功能”这一重要概念(auteur fonction)。在福柯看来,写作者与作者是不同的,譬如一封信无法拥有一个作

① Roger Chartier, "Text, Printing, Reading,"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162.

② 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trans. by Lydia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 167.

③ 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pp. 11—12.

④ Roger Chartier, *The Author's Hand and the Printer's Mind*, trans. by Lydia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p. 61—64, 150—154.

⑤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p. 249—250.

⑥ Roger Chartier, *Au bord de la falaise*, p. 81.

者,而只可能有一个写作者(rédacteur)。换言之,作者的名字不是一个普通的能指,它能够确定一系列话语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意义:作者“担当了某种分类性(classificatoire)的功能,使我们可以将某些特定的文本归类,划定文本之间的边界,将某些文本排除在外或者与其它的文本加以对比”。^①夏蒂埃对于“作者一功能”这一概念非常感兴趣,并且进一步对“作者”的角色(personnage)进行了某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考察。

夏蒂埃发现,中世纪时期不同作者的作品往往会被抄入同一本书中,所以此时作者尚不具有整合话语的功能。^②这种情况直到17世纪初依然存在,例如1623年莎士比亚的第一版对开本全集出版之前,他的部分剧本——如《受辱的卢克莱斯》的节选就曾与他人的作品合订出版过。^③夏蒂埃提出,一方面,印刷术的应用在“作者一功能”的出现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印刷品的广泛传播,使得出版商出于经济考虑更倾向于将作者的作品放在一起出版,如17世纪出版的本·琼森(Ben Jonson)和莎士比亚的对开本全集。^④另一方面,思想界对于“作者”这一概念的观念也在18世纪发生了巨大改变。在部分启蒙思想家看来,作者不过是一个理念的信使,自身无法创造观念;然而,狄德罗等人却开始质疑这种看法。夏蒂埃重点考察了狄德罗在1763年应巴黎书商的要求而写的一封陈情书:由于王庭剥夺了书商对于拉封丹《寓言》的出版特权,他们希望狄德罗为自己进行辩护。然而,狄德罗在陈情书中的论点其实与书商的愿望有着不小的差异:在书商看来,王室不能随意剥夺他们的特许权;而狄德罗则认为,任何作品都应该是作者个人的文字“所有物”,作品之所以能够出版是因为作者在与书商签订了合同后出让了自己的“所有物”。^⑤根据狄德罗的看法,作品中的观念虽然是世人共有的,但是对于观念的组合却是作者个人的创建,充满了作者的情感、经验与思想,具有不可复制、不可化约的个性与特点。夏蒂埃指出,随着18世纪“作者”身份的神圣化,读者产生了一种对书籍的完美版本的渴求,而书籍也就逐渐拥有了物质对象与公共话语这两种不同面相。书籍的物质性往往被忽略,而书籍承载的文本则被视作独立的、纯粹的、超越物质层面的存在(immaterial existence)。^⑥在夏蒂埃看来,文本与书籍的关系远比心态史家想象的复杂,书籍史家和文化史家首先需要对自己的一些根本理论预设进行反思,并且从社会史和观念史的角度对“书籍”“文本”“作者”等概念进行一番考察。

三 文化表象如何塑造社会实在

虽然夏蒂埃以书籍史研究起家,然而他一直试图将书籍史更好地融入广义的文化史领域,并且对文化史的方法、路径和学科属性都有着深入思考。在夏蒂埃看来,心态史根本的弊病,在于它虽然将文化视作研究对象,但仍然明显地采用了社会史的视角,导致对大众文化和集体信仰的看法过分简单。心态史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者们发现单纯的“系列史”对于某些问题缺乏解释力:例如,统计模型或许可以帮助历史学家了解某个地区在某段时间内结婚率或出生率的变化,却无法指明这些变化背后的人类行为模式。^⑦阿里耶斯在勒高夫等人编写的《新史学》一书的“心态史”词条中就指出,对前人的行为方式感到陌生与难以理解是历史学家最经常面对的难题,也是心态史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T. I, Paris: Gallimard, 2001, p. 827.

② 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pp. 56—58.

③ Roger Chartier, *The Author's Hand and the Printer's Mind*, p. 13.

④ Roger Chartier, *The Author's Hand and the Printer's Mind*, pp. 74—79.

⑤ Roger Chartier, *Inscription and Erasure: Literature and Written Culture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7, pp. 128—132.

⑥ Roger Chartier, *The Author's Hand and the Printer's Mind*, p. 11.

⑦ André Burguière, *The Annales School: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05.

的前提。^① 在心态史家看来,每个社会都存在着某种深刻地影响个体行为方式的集体信仰与群体态度;正如勒高夫所说“心态史处理的是日常的与不加反思的层面……它力图揭示的是人所共有的、非个性化的思想内容。”^②然而,一些心态史家逐渐将这种“集体心态”等同于普罗大众独有的、与“精英文化”对立的“大众文化”;在他们看来,某个群体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差异被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所谓的“大众文化”也就是对精英文化的一种被动吸收。

夏蒂埃之所以将心态史和“第三层级的系列史”称为“文化的社会史”(l'histoire sociale de la culture),正是因为这些历史学家将社会层级预设成一张能够过滤、分类和组织文化的栅栏(grille),并且将层级差异完全建立在经济因素与社会地位之上;似乎拥有更多财富的群体就是精英,而大众天然是对立面。显然,他们忽略了年龄、宗教、性别、教育背景、地域、职业同样也是划分社会阶层的因素和导致文化差异的原因。^③ 夏蒂埃在研究大革命前期的政治请愿书之后发现,农民和城市居民在对待文化传统和政治的方式上有着巨大鸿沟,法国巨大的地域和城乡差异意味着某种统一的整体文化很难存在。^④

在夏蒂埃看来,几乎任何文化制品都是某种“混合品”或“合金”(alliage),很难真正确定它究竟属于哪一个特定的阶层,所以并不存在所谓“大众”与“精英”这两种业已给定的(donnés d'avance)、并置的(juxtaposés)文化形态。通过援引米哈伊尔·巴赫金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对于《巨人传》的评价——“在他创造的世界中,各种不同属性的因素以无比清晰的方式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统一。他的作品是一部大众文化的百科全书”,夏蒂埃指出,庶民文化(folklorique)有时恰恰最好地保存在所谓的土人作品(lettré)中。^⑤ 他由此认为,“文化的社会史”忽略了文化可能具有的主动性与自主性,以及文化在阶层建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为此,他提倡用一种“社会的文化史”(une histoire culturelle du social)路径取而代之。如果从研究方法上比较“文化的社会史”与“社会的文化史”,那么前者将文化视作社会、经济层级的一种反映,而后者更注重文化制品的个体性,试图考察不同的阶层、群体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占有”同一个文化制品的。此外,“社会的文化史”虽“始于文化”,但并不“终于文化”:夏蒂埃从未停止对社会史的关注,反而认为文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层级的构成。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何认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正是夏蒂埃的文化史有别于心态史的根本之处。

夏蒂埃始终高度关注社会学,尤其是埃利亚斯与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他曾为《宫廷社会》的法文版撰写前言,1988年还和布迪厄在法国文化电台进行了五次对话。在埃利亚斯与布迪厄看来,社会结构并不是可以通过外在的标准进行衡量和判定的实体,而是体现在每个群体用来塑造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与文化产品上。埃利亚斯在《宫廷社会》中指出,社会学最根本的任务是探究某个社会的构建方式与样态,也即人与人之间是以怎样的方式互相关联与依存的。一方面,社会形态的变化会改变人们的“气质”(ethos)和被埃利亚斯称为“惯习”(habitus)的第二天性。另一方面,社会结

① Jacques Le Goff, Roger Chartier et Jacques Revel dir., *La nouvelle histoire*, Paris: CEPL, 1978, pp. 402—403.

② Jacques Le Goff “Les mentalités: Une histoire ambiguë,” *Faire de l'histoire*, dir. 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 Paris: Gallimard, 1974, p. 733.

③ Roger Chartier,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 The French Trajectories,” in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Kaplan 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3—34; Roger Chartier, *Au bord de la falaise*, p. 74.

④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p. 110—114. 夏蒂埃发现,在农村,请愿书的内容是由农民决定的,但是它们的作者却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并且,请愿书的书写沿袭法律以及行政文书的形式。这反映出传统的职业文化、官僚文化与启蒙文化的对立在农村其实并不是特别强烈。相较之下,这种对立在城市则表现得非常激进,城市居住者明显对抽象的启蒙概念更感兴趣,而农民的请愿书则更加关注和日常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并且,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情况也不一样,地理位置上靠近城市的农村受城市的影响明显更深。

⑤ Roger Chartier, *Au bord de la falaise*, pp. 52—53.

构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存在于人类的行为模式之中。^①他在书中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贵族仍然会把大量财富花在室内装饰、排场以及服装上。这种行为虽然损害经济利益,但却是维护地位的必要之举,因为“一位不按照公爵应该生活的方式生活的公爵就不再被认为是一位公爵了”。^②埃利亚斯指出,这说明社会地位的体现离不开文化表象,并且内化于人们的观念与脑海之中。

相比之下,布迪厄在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区隔》一书中对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做了更精密的分析。布迪厄主要关注“审美趣味”这一问题。首先,他发现“审美”趋向并不完全是个人偏好的结果,而是受到他所在社会阶层的影响。社会分层不仅取决于收入、职业、教育等因素,也同样表现在文化层面(比如品味、食物和衣着)上,所以“品味”是“阶级”的“风向标”(markers)。^③其次,布迪厄提出,我们不能将文化单纯地理解为文化产品,而应该将其视作某种“资本”。一方面,文化资本表现在对音乐、艺术和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上。如同财富资本一样,文化资本可以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被传递到下一代,这就使得同一个阶级成员的品味具有可被继承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虽然每个阶层都可以对“美”“高雅”“艺术感”等问题进行定义,然而掌握更多文化资本的阶层给出的定义往往会被更广泛地接受,他们的品味也相应地被视作是高雅的、文明的、属于精英阶层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正是体现在了审美与文化层面上,文化也就参与到了社会阶层的建构之中。正如布迪厄在《区隔》的前言中所说“品味可以分类,品味还可以给分类的标准分类。社会主体在对于美与丑、卓越与庸俗进行分类与区分的时候,也将自己进行了分类与区分。”^④

在夏蒂埃看来,埃利亚斯和布迪厄的最大贡献是对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做了比以往社会学家更精微的解释:他们不再将社会阶层视作一种固化的客观存在,反而把文化当作能够反映社会实在的“表象”,由此打通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文化史不仅不是社会史的附庸,反而是社会史家和社会学家必须加以考虑的一种视角:

当文化史致力于研究某个社会团体用于表现自身以及他者的“表象”——也就是说当它不再执迷于传统社会史的视角时,它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反思社会问题,因为它所关注的是社会层级与社会关系是如何被决定的,以及人们脑海中的社会实在是如何建构某个阶级、团体或社会氛围的身份的。^⑤

集体表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是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的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为某个社会群体所共有的、用以理解和规整世界的观念、仪式和工具。一个社会的构成不能离开各种集体表象,因为它可以凝聚社会成员,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某个共同体的一份子。根据费雷迪埃(Furetière)著于17世纪的《通用词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的说法,“représentation”一词有两种不尽相同却又不无联系的定义:首先,它指的是用来代表某个不在场之物并使其“在场”的替代品。替代品与缺席者虽然存在替代关系,但依然是完全不同的。在英、法两国的政治传统中,国王安葬之时,棺木上都会安置一个以蜡或木制成的人像,用以替代已经离世的国王。这个人像就可以被称作“représentation”。其次,“représentation”指通过某个习以为常的形象来表现某种抽象物,如用狮子代表勇气,用男性生殖器代表坚持不懈,而用鹈鹕代表母爱。与“représentation”的第一层定义不同,这里涉及象征而非替代的关系,所以象征物与象征对象二者是一体的。也就是说,“représentation”既表示某种象征性的关系,这时可以被当作“表现”理解;而它同时也是象征物本

① Norbert Elias, *The Court Society*, trans. by Edmund Jephcott, Dubl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2006, p. 29.

② Norbert Elias, *The Court Society*, p. 71.

③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xxv.

④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p. xxix.

⑤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 9.

身,这时一般作为“表象”解。夏蒂埃使用更多的是第二种定义中的“représentation”。^①

在夏蒂埃看来,包括书籍、图画、仪式和服装在内的文化产品都应该被视作是一种表象。它们不仅有娱乐、文化传播和信息交互的功能,更是群体赋予自己生活的世界以意义与秩序的途径。人们通过表象来认识、感知与建构社会实在,而社会实在存在于表象之中。举上文曾提及的《乔治·唐丹》为例:一方面,所谓的阶层差别深刻地体现在看待这部戏剧的不同态度上;另一方面,巴黎普通民众通过观剧而加强了他们的阶层意识,这表明表象进一步塑造、固化了社会实在。由此,“社会的文化史”并不只是“文化”或“文化产品”的历史:

我在这里对于这个称谓(注:指文化)的使用并不是依照法国史学常常加之于它的那个意义上的……文化并不能超越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之上,它也不能被等同于经济与社会。一切实践都是根据个人用以理解他们自身存在的表象才得以表达的,所以他的理解以及表象的意义被深深地刻入了他的语言、行为与仪式之中……所有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的、经济的,也同样是“文化的”……由此,所有的历史——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宗教的——都需要研究表象的系统。而这,就是文化史。^②

夏蒂埃认为,表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让我们认识社会实在。首先,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创造“具有分类与区分功能的知识产品”来建构他们脑海中的社会实在。夏蒂埃和布迪厄一样,认为文化是一种“场域”,不同的群体在其中利用他们各自的“表象”进行斗争,以求获得定义“文化”的权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表象探究不同群体在社会等级中所处的地位。其次,表象是“某种实践活动”,代表“对某种社会身份的认同,或者是展示某种存在感,以及象征性地指向某种地位或等级”。例如,宫廷的内部装饰、礼仪以及贵族宅邸的房间布局看似并不起眼,却透露出等级与身份的差异。第三,表象可以是“某种制度化的、客观化的形式”,固定且明显地“标志某个群体、团体或阶层的存在”。比如,旧制度法国士兵的制服不仅华丽,而且任何一丝细微的点缀都可以作为区分等级高下的标志,这样就能够通过客观形式激发尊崇与服从。^③

“社会的文化史”可以被视作夏蒂埃面对心态史研究方法越发僵化、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下提供的一种新思路。他试图克服“文化的社会史”的理论缺陷,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探究文化是如何反映并参与塑造社会结构的。从实际研究的角度来看,“社会的文化史”较之传统心态史与文化史的一个明显优势是具有更加广阔的视角。除了书籍,各种传单、手册、广告、宣传画、版画等都能够被视作是一种“表象”;甚至,仪式、服饰也成为了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例如夏蒂埃本人对于大革命前的请愿书、版画中的“颠倒世界”以及“死亡指导书”(Ars moriendi)的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文化史研究的范围。^④

四 社会的文化史与新文化史:表象还是象征?

自20世纪70年代起,文化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林恩·亨特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出版后,“新文化史”这一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史学实践更是受到欧美特别是北美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成为新文化史最主要的理论来源之一。正如金兹堡所说“使用‘文

① Roger Chartier, *Au bord de la falaise*, pp. 79—80.

②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 11.

③ 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pp. 9—10.

④ 在16到19世纪的法国版画中,大量出现了“颠倒世界”这一主题。在这些版画中,许多常见的社会关系被颠倒过来,如男人穿着女装、农民骑在马上而国王反倒光着脚、患者为医生治病、文盲给学者上课。在夏蒂埃看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正可以通过这些作为表象的版画得以体现,当时的人们也很可能通过这些表象而确立了自身的身份认同。见 Roger Chartier, “The World Turned Upside-down,” *Cultural History*, pp. 115—125.

化’这一术语来定义那些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属于下层阶级的态度、信仰和行为符码是相对最近才从文化人类学中借鉴得来的。”^①在“新文化史”家中，达恩顿是象征人类学理论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之一。1984年，达恩顿出版了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屠猫记》。达恩顿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本论文集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文化史研究中引入象征人类学的、特别是克利福德·吉尔兹的理论。此书的书名取自其中《屠猫记》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达恩顿考察了18世纪中期巴黎的某个印刷作坊中一场针对猫的大屠杀。故事由一个名叫贡塔(Nicholas Contat)的印刷工所记述(根据达恩顿推测，故事的虚拟主人公杰罗姆[Jerome]的原型正是贡塔自己)，讲述了杰罗姆和其他学徒饱受印刷作坊主人虐待，整日劳作却食不果腹；然而，主人和他的妻子宠溺的爱猫们却享受着比工人更为丰盛的食物。两相比照之下，工人们气愤难平，便决定通过杀猫进行报复。他们将猫的尸体四处悬挂，并且在之后的日子里乐此不疲地表演杀戮的情景。达恩顿提出，猫在旧制度的法国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巫术、放荡、通奸和狂欢；通过杀戮女主人的爱猫，工人实际上嘲讽、戏弄了男主人。^②

夏蒂埃与达恩顿的研究都侧重于书籍史和文化史，并且他们对心态史的研究范式都有诸多反思。不过，在《屠猫记》出版之后不久，夏蒂埃就在美国《现代史杂志》上发表了《文本、象征与法兰西性》一文，对达恩顿的研究提出了质疑。首先，尽管达恩顿认为贡塔文本中的某些词语和表达方式暗示了猫与巫术之间的隐秘关系，但是他却没有就这些表达方式是否在18世纪拥有他所认为的那种含义做进一步的语义学分析(semantic analysis)。其次，夏蒂埃认为达恩顿滥用了“象征”(symbol)这一概念。例如，费雷迪埃的《通用词典》将“象征”定义为某种“符号、模式、徽章或对某种道德的表现”，而对于“符号”的定义中则没有“象征”这一意项。换言之，“象征”虽然是一种涉及表现关系的特殊符号——并且这种关系必须被广泛承认、不会引起误解，但并不是所有的符号都是“象征”。在夏蒂埃看来，达恩顿所说的“象征”可能不过是一种符号而已。第三，夏蒂埃和达恩顿之间针对贡塔的文本性质有着很大的分歧。达恩顿认为贡塔的故事具有自传性；然而在夏蒂埃看来，贡塔的叙述中虽然不乏自己的经验，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屠猫行为确实存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十分流行揭露某个行业内幕的所谓“八卦手册”，而贡塔的文本似乎就属于这种类型，它不能用来反映，遑论对应于某个历史实在。^③

面对夏蒂埃的质疑，达恩顿在《现代史杂志》上发表了《历史中的象征因素》一文作为回应。达恩顿反驳道，夏蒂埃援引《通用词典》的定义批评自己滥用了“象征”这一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通用词典》仅仅体现了官方的语言标准，并不能反映民间如何看待、理解“象征”概念。其次，尽管身处同一文化中的不同个体可能对某种象征关系有着不同理解，但在人类学家看来，象征的歧义性再正常不过“仪式虽然具有多重含义，但它们并不乏内在的制约。它们采取固定的行为模式，具有固定的意义限度，以至于即使历史学家并不知道每个人是如何理解、运用文化的，他还是可以准确地划定其范围。”^④最后，达恩顿澄清道，即使贡塔的故事涉及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是不准确的，也并不妨碍我们通过这份文本了解这个事件对当时的阅读者的意义，因为人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正是理解这一文化的关键符码。

通过考察夏蒂埃与达恩顿的论辩，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分歧来自两方面：首先，二人对于“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对于吉尔兹等文化人类学家而言，文化“从根本来说是符号学意义上的……人是一种永远缠绕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所以

①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p. xxii.

②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 99.

③ Roger Char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57, no. 4(1985), pp. 682—695.

④ Robert Darnton, "The Symbolic Element i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58, no. 1(1986), pp. 218—234.

“文化分析也就不是一种寻找定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一种注重阐释的、寻找意义的学科”。^①和吉尔兹一样,达恩顿也将文化看作一种语境,一切事物、事件、行为都需要被纳入其中才能彰显它们的意义:“当我们发现某个事物是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将它纳入从我们的文化中继承的认识秩序,并将它用语言表达出来。”^②在他看来,历史学家为了理解某个文化,就必须考察身处这个文化之中的人如何理解他们的行为,而这也就是吉尔兹所谓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夏蒂埃则认为,文化不是一种提供意义的、无所不包的“网络”,而是内部永远充满了矛盾与差异的“场域”,所以通过考察作为“表象”的文化制品,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不同社会群体的自我认同,加深我们对于某个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的理解。总的来说,夏蒂埃虽然常常被新文化史家引为同道,然而他对于文化这一核心概念的看法与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径有着明显区别。他非常明确地表示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文化概念:

第一种定义可以被布迪厄所构建的“文化场域”这一概念所表达……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文化做出了各种限定,这些社会群体处于某种竞争关系中,它们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争夺“文化”的定义权……第二种定义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它指的是个体或群体赋予他们与他者、与世界、与过往的关系的过程。^③

总的来说,夏蒂埃不仅对新文化史是否已经具有统一且成熟的研究范式保持怀疑,他也不认为人类学是文化史家唯一应该采纳的视角。^④如果说达恩顿希望从仪式等文化行为中分析人类的行为方式,那么夏蒂埃则更加关注文化与社会以及文化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

结 语

夏蒂埃曾经指出,正如纯粹的思想史研究并不太受法国历史学界重视,文化史(histoire culturelle)这一概念同样不常单独被法国历史学家使用。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关注文化,只是更加习惯于把文化、思想和信仰视作一个综合体加以考察。英国人类学家劳埃德在他的《解构心态的神话》一书中曾指出心态史的两个理论困境:一方面,是否任何时代都拥有一个统一的集体心态?另一方面,既然心态是一种具有稳定性的思想结构,那么它又如何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⑤夏蒂埃用“社会的文化史”取代心态史,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上述质疑。在他看来,心态史或“第三层级的系列史”的一大缺陷,是误认为读者会自动、毫无保留地接受书籍中的内容,书籍所传达的意义来自且仅来自于作者。夏蒂埃关注的重点并非书籍的流通情况,而是通过考察书籍的生产、传播与阅读状况,清晰地揭示文本、书籍与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个复杂的机制,书籍的物质属性则可能会增加、改变文本的意义。此外,阅读本身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实践,所以阅读史和文化史应当考察的是民众接触文化产品的方式,他们如何“占有”作者、出版商以及审查机构施加的意义。夏蒂埃指出,心态史的缺陷还在于错误地理解了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对应于“大众”的“大众文化”;文化不仅不是为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反而具有塑造社会结构的能力。社会实在由作为集体表象的文化和文化产品构成,后者才是人们理解、规划与定义外在世界的方式,也是凸显社会阶层的标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夏蒂埃成功地说明了文化史研究对于社会史的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起,夏蒂埃经常赴美国讲学,担任宾夕法尼

①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5.

②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 186.

③ Roger Chartier, "Writing the Practice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1, no. 2 (1998), p. 263.

④ Roger Chartier, "La nouvelle histoire culturelle existe-t-elle," *Cahiers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n. 31, avril 2003.

⑤ G. E. R. Lloyd, *Demystifying Mental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38—139.

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且积极参与美国文化史学界的讨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英语译本,受到北美学界高度重视。然而,夏蒂埃与达恩顿等文化史家的论辩在一方面表明,双方对于“文化”这一概念存在着不同的构想——前者更多地援引布迪厄和埃利亚斯的文化理论,而后者则更深地受到吉尔兹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的讨论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法国与美国史学界不同的发展脉络、研究方式和理论关怀。

达恩顿曾经评价道“罗杰从来不做档案研究,但他用不着,因为他有那么多想法!”^①与传统的文化史与心态史相比,夏蒂埃的“社会的文化史”促使历史学家开始重视某些此前不被注意的文化现象与文化制品(如印刷、出版商、戏剧形式、图像、版画、节日等)。在近些年出版的作品《铭写与忘却》(*Inscription and Erasure*)以及《作者手笔与雕匠心语》(*The Author Hand and the Printer's Mind*)中,他开始更多地利用传统的思想史或者文学史的材料(如塞万提斯、狄德罗、本·琼森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探究历史上的文化生产方式,挖掘“文本”和“作者”地位的上升与印刷术的大规模应用之间的联系。这不仅表现出夏蒂埃本人高度的理论敏感度,似乎也暗示了某种文化史的发展趋势与可能性。

(责任编辑:杜 倩)

^① 玛丽亚·露西亚·帕拉蕾丝-伯克《新史学:自白与对话——九位当代最著名新史学家的访谈录》,第209页。

Culturo-Social History and Socio-Cultural History: Roger Chartier's Academic Inquiry in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istory **LI Ren-zhi**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shed light on how Roger Chartier rethinks the French tradition of history of mentalities and criticizes the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It, contending that apart from empirical studies, Chartier theoretically reinterpre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culture is the presentation perceiving, scheming, and defining social realities, points out that Chartier's socio-cultural history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prevailing in the North America.

Historiographical Postposition of Reign Title: The Case of *Narrative Rules of Book of Han*

SHEN Xiang-hui

The present paper contends that, on the surface, the postposition of reign title, that is, attaching a reign title of previous dynasty to that of new dynasty, contradicted the historical fact, but actually it profoundly accorded with what really took place in history. It sets forth this point by examining *Narrative Rules of Book of Han* authored by Yan Shigu, pointing out that this handling was a very special genre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revealing how the ancient Chinese understood the dynastic change.

Forcing Yuan Shikai to Abdicate by Military Means: Japan's Ultimate Scheme in National Campaign Defending Republic of China **CHENG Hong-lei**

Japan regarded the outbreak of anti-Yuan Shikai campaign defend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an unprecedentedly good opportunity. Therefor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dictated by the club of brass, formulated the strategy of overthrowing Yuan's government and founding a pro-Japan regime in China. Japan even planned to persuade Yuan to abdicate by sending troops to Beijing.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is period and how China's domestic political struggles affected its foreign relations.

(池 楨 译)